

HAINAN
HISTORY
&
CULTURE

第三卷

海南历史文化

主 编 闫广林
副主编 刘复生 常如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海南历史文化

HAINAN
HISTORY & CULTURE

主 编 闫广林

副主编 刘复生 常如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南历史文化. 第3卷 / 闫广林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097 - 4550 - 2

I. ①海… II. ①闫… III. ①文化史 - 海南省
IV. ①K29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0360 号

海南历史文化 (第三卷)

主 编 / 闫广林

副 主 编 / 刘复生 常如瑜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宋 超

责任校对 / 李秀军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550 - 2

定 价 / 49.00 元

印 张 / 16.75

字 数 / 268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 编：闫广林

副 主 编：刘复生 常如瑜

编辑部成员：闫广林 刘复生 张朔人
常如瑜 张 睿

文字校对：岳 芬

主办：海南省历史文化研究基地
海南大学海南历史文化研究基地

目 录

· 名家特稿

文明困境与历史挑战 孙皓辉 / 3

· 海南移民史

海南人口迁移路径问题 张朔人 / 29

从地名看海南移民文化 刘 显 / 38

从文昌迁琼始祖墓地看移民的“风水”观 阎根齐 黄志健 / 46

海南人的移民情结 岳 芬 常如瑜 / 57

唐宋之后移民在海南的宗族构建 赵全鹏 / 67

清代海南移民的新趋势 周伟民 唐玲玲 / 78

· 南洋文化研究

下南洋，跨世纪的悲壮 蔡 葩 / 105

海南文化的近代转捩 闫广林 / 120

海口骑楼老街的形成 安华涛 / 142

论海口骑楼街区之拯救 白 多 / 152

· 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论非遗文化的市场经济与产业化重构

——以海南为例 张军军 / 165

记忆与文化的象征

——琼剧大师梁家桢的故事 李 骞 / 177

黎锦传承与保护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方婷婷 王献军 / 186

黎族文身的抢救性保护与合理利用 王献军 / 200

海南现存金石刻文简述 李长青 / 209

· 域外文评

拂拭尘积见海南

——读辛世彪译注两种 单正平 / 221

再现他者与自我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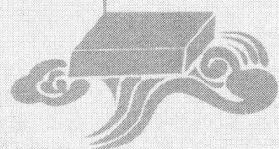
——从香便文的《海南纪行》谈传教士的域外书写 耿占春 / 229

织物的历史、记忆与未来

——黎锦与东南亚织品的比较 常如瑜 岳 芬 / 252

稿 约 261

名家特稿



文明困境与历史挑战

孙皓辉

—

在近年的相关研究中，我看到这样一则公开资料——

中国的耶路撒冷

市场精神在中国的兴起，是众所周知的故事。但你是否了解新教道德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根据中国基督教组织中国伙伴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分别所作的调查，目前中国拥有大约4000万名新教基督徒，而在1949年几乎不足50万。一些估测甚至认为，中国基督徒的总数最多可达7500万到1.1亿。再加上2000万的天主教信徒，中国基督徒的总数可能高达1.3亿。今天，中国现有的基督徒总数可能已经超过了整个欧洲。在中国，教堂的建设速度比任何国家都快，《圣经》的印刷量也比任何国家都多。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圣经》印刷厂。自1986年成立以来，其大型印刷厂已经印刷了超过7000万本的《圣经》，其中5000万本是普通话或中国其他方言的版本。在未来30年，基督徒在中国人口中的占比可能达到20%—30%。考虑到中国历史上基督教的传播所面临的巨大阻力，如此迅速的发展确实令人惊奇。

基督教之前未能在中国扎根的原因，仍然是一个谜题（略去基督教教士渗透中国的历史简述——引者）……截止1877年，中国一共

活跃着 18 个不同的基督教传教团和 3 个《圣经》协会……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和吴耀宗共同起草了一份《基督徒宣言》。1950 年至 1952 年，中国内地会决定撤出在新中国的人员。传教士离开后，大部分教堂也随之关闭或被改造成工厂。在接下来的 30 年里，这些教堂都未能再次打开大门。

对马克斯·韦伯及 20 世纪晚期的许多西方专家而言，基督教在中国繁荣及其产业化的可能性很低——甚至与欧洲去基督教的可能性一样低。这不足为奇。

位于上海市南边的浙江省温州市，是中国著名的制造之乡。这个城市里有 800 万人口，并且仍在继续增长。它被誉为中国最具企业家精神的城市，一个自由市场下的城市，国家只扮演着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纺织厂和堆积的煤炭的景象，可能让维多利亚时期的人觉得亲切——这里就是亚洲的曼彻斯特。

……

然而，真正让人着迷的是，温州人不仅从西方引入了工作伦理，他们还引进了新教。150 年前英国传教士在这里埋下种子，以最出人意料的形式，迎来了迟到的萌芽。“文化大革命”前，温州城里仅有 480 座基督教堂，如今得到政府批准的教堂就已达 1339 座之多。新建的教堂，屋顶上大多竖立着明亮的红色霓虹十字架。由此看来，温州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也就不足为奇了。2002 年，基督徒已占到温州人口总数的 14%，今天，这一比例只会更高。在温州附近的农村，各个村庄也争相攀比其教堂塔尖之高。

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已绝非鸦片之于民众。温州最虔诚的基督徒中，有一群被称为“老板基督徒”，如企业家、世界第三大制笔商、爱好公司主席张汉平。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张汉平就是市场经济与基督教伦理成功融合的鲜活典范。农民出身的张汉平 1979 年开始做塑料生意，8 年后成立了他的第一家制笔厂，现在，他手下约有 5000 名工人，每年生产 5 亿支笔。在他看来，基督教之所以在中国繁荣起来，是因为基督教为努力应对社会转型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道德框架；今天的中国社会上信任缺失，尔虞我诈，员工偷窃雇主，姑娘诈婚骗取财礼，有毒食品与豆腐渣工程等处处可见；可以信任基督徒教友，

因为他们努力工作，诚实守信。

.....

今天，南京的圣保罗堂是一个典型的官方“三自”教堂。在这里，会众已经从1994年的几百人发展到约5000名固定礼拜者。这座教堂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新成员须在附近4个附属小教堂里通过闭路电视观看礼拜的过程。自从1982年的第19号文件颁布后，“家庭教会”运动也断断续续地得到了官方允许，教徒们或公开或秘密地在家中会面，并往往采用美国的礼拜方式。

在北京，礼拜者蜂拥到金明日牧师所在的锡安教堂，这是一座只有350名成员的非官方教堂，但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是企业家或职场精英，并且年龄都在40岁以下。在中国，基督教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唐逸等中国学者公开预测，基督教信仰可能将中国文化基督教化，尽管它或许“和佛教一样，被中国文化吸收……并成为中国式宗教”，或“保留其基本的西方特点，成为一种次文化非主流宗教”。

学者卓新平认为：“基督教对超然存在的理解”，在当代西方人们接受社会和政治多元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卓新平指出：“只有将对超然存在的这种理解作为我们的标准，我们才能理解自由、人权、宽容、平等、公正、民主、法治、普遍性和环境保护等概念的真实含义。”

基督徒、电影制作人远志明也对此表示赞同：“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教。”改信基督教的赵晓教授也指出，基督教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公共道德基础”，这个基础可以减少腐败、缩小贫富差距、推动慈善发展，甚至是防止污染。另一学者也指出：“经济的可行性需要严谨的道德风貌，不仅仅是消费享乐主义和虚假欺诈策略。”

在我的研究历史上，这是引用最长的一则综述性资料。

上述关于基督教在中国当代传播情况的调查与回顾综述，以及中国相关人士的看法与评价，是英国著名金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近著《文明》中的一个专节——“中国的耶路撒冷”中最为核心的部分。^①

① [英] 尼尔·弗格森：《文明》，曾贤明、唐颖华译，中信出版社，2012，第262-268页。

二

这则综述性资料,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惊讶,也不仅仅是震撼。

对于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我们无可厚非。可是,西方基督教普遍传播如无数暗流渗透弥漫于中国社会,这样一个重大现象,远远不是简单的“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可以解释的。举凡关注中国现实状况的人,都明白无误地知道一个事实:中国当代社会的道德基础与价值体系,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中国文明正在经历 5000 年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全面危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正在面临空前复杂而严峻的历史挑战。之所以空前复杂,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不但要承担古典文明史上曾经的战略选择失误所带来的累积后果,还要承担近代史以来发生在我们视野之内的文明失误及其所沉积的现实后果,更要有效抵御异质文明的强大侵蚀与全面渗透。

我们头上顶着绚烂的经济花冠,脚下却陷进了交错的文明泥沼。

悠久与古老,既是一种深远强大的根基,更是一种举步维艰的重负。

2000 多年前,西汉王朝中期的汉武帝时期,抛弃了中国在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 600 年左右奠定的强大的社会意识多元化传统,遏制百家,选择了一家思想“独尊”的道路。从那时起,统一强势的中国文明的蓬勃洪流,由思想专制而导致的创造力衰减开始出现,并进入了日渐全面衰减的历史过程。这种衰减趋势,持续到宋代已经开始僵化,到明清两代则已经开始腐朽了。

这是遥远的中国古典社会在曾经的历史大转折时期所作出的错误选择带来的历史后果,是我们这一代人所无法预料的。但是,它终究是我们这个民族曾经的历史失误。沉重的历史后果,必须由中华民族的后裔来承担。这是民族历史责任的无代次性,我们无法回避。中华民族的历史光荣属于我们,历史责任自然也属于我们。

如果说,这还是一种遥远而间接的历史责任。

那么,近代史以来的历史失误,则已经是比较直接的历史责任了。

当 15 世纪的西方世界已经开始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迈向新的工业

文明时，中国文明已经呈现出衰减的历史。当1840年西方列强掀起的战争风暴来临时，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文明已经丧失了对新世界的理解力，已经变得只能以割地求和为生存手段了。剧烈的变化、国家的衰朽，激发了人民自救的社会大潮。将近两百年中，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连绵卷来的各种历史漩涡中挣扎。我们力图摆脱2000年以来累积的沉重历史包袱，力图轻装上阵，力图重新开始，力图杀出一条血路来。这种普遍的社会精神，激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救亡图存与共和革命两大历史洪流。

中华民族终究没有彻底倒下，终究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

但是，血战突围，毕竟难以冷静审视一切。在社会精神领域，这两大历史洪流以很难避免的简单化与政治化方式，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几乎硬生生地将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需求与中国文明历史的传承切割开来。我们对中国5000年历史所锤炼出的文明根基，都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全盘性否定，而是一概作为“封建残余”，一概作为“孔家店”，一概作为“四旧”，一概作为“封资修”，彻底“打倒”了，彻底“抛弃”了。两柄大斧，似乎砍断了缠住我们双手双脚的枯藤，我们终于可以相对轻松地战斗了。我们曾经满怀信心，因为我们相信“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就是说近两百年以来，中华民族曾经两次与自己的历史隔绝。

之后的现实状况是，这张社会“白纸”，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30余年的新时期里，迅速地变成色彩斑斓、危机四伏的文明沼泽地。虽然历史地看问题，我们无由谴责曾经的血战突围、曾经的革命大潮中发生的悲剧性失误。但是，我们可以认真接受历史教训，应该承担先辈的历史失误带来的消极的、恶性的历史后果，并且努力寻求真正的文明发展道路。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明历史而言，没有将国家决策层与人民大众区别开来的可能，也没有因代次久远而产生责任豁免的可能。任何时代的国家历史抉择，都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产物，在本质上都是我们民族整体在当时的历史抉择。作为人民的一员，作为这个民族的后裔，我们既有权利获得这种抉择有可能带来的巨大发展利益，也有义务承担这种抉择有可能带来的深重历史灾难。在文明史面前，任何人以“人民一员”自居，或以绝对真理自居，热衷扮演绝对正确者的角色，隔绝历史的不可分割的连续性，拒绝承担历史后果，进而走向自外于民族文明的道路，都是虚无主义

的浅薄与轻率。

当代德国人，为曾经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而深重忏悔，并获得了全世界普遍的理解。这种历史精神的内涵何在？正在于承载日耳曼民族文明历史的德国国民的文明整体意识，在于历史责任的无代次价值观。

三

改革开放 30 余年来，中国的历史航标已经作出很大的修正。

在深刻体现历史需求与现实需求的正确国策下，我们既从隔绝于文明历史的“白纸”中走了出来，也从现实的自我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在这条航道上，我们已经驶出了较长的距离。我们的开放，已经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我们的改革，也已经在经济领域获得长足的发展，并且浸渍出有可能走向深化改革的精神基础与社会基础。可是，在经济发展绝对主线化、绝对主导化的条件下，在商品交换关系、利益关系突然而普遍地弥漫为主导性社会价值观的状况下，我们在国家层面上忽视了大规模的道德重建。从本质上说，这是我们的国家意识忽视了在空前复杂的转折时期，在新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中国文明的继承与重建的历史使命。由此，我们的国家出现了中国文明史上空前的忧患与危机。

这种空前的忧患与危机，其最深刻之处在于五个基本方面。

其一，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体系与道德基础正在趋于崩溃。

就表层而言，中国的文明危机正在以两个基本方面呈现出来。一是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体系与道德基础，正在趋于崩溃。二是普遍的商品经济活动所连带产生的恶性交换价值观，正在洪水猛兽般泛滥弥漫于我们社会的每个角落，成为中国当代社会价值观的畸形主宰。

从世界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历史实践看，既往任何时代的商品经济法则及其利益交换价值观，都受到当时社会的整个价值观体系的有效制约；国家法律、国营商市、社会道德、伦理价值等诸多方面，都对私人商品经济行为有一定程度的限制，都有有效制约的综合表现。在这样的综合制约下，良性的商品交换价值观得到弘扬，恶性的利益交换价值观得到遏制；

无论官商私商，古典商品经济活动自身的价值法则，都大体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体系保持着相同的品质，同样体现了人类古典文明在基本方面的高贵性、诚实性与可靠性。

从中国文明的历史实践看，自商人（殷商族群）开创以私人商旅活动为基本生存方式开始，中国就有了官商与私商并存的商品经济活动。到战国时代，商鞅变法正式破除了西周确立的土地买卖禁令，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主人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从此，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开始成为商品，中国进入了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普遍化时期。从那之后的2000余年，中国古典社会基本上是发达的农耕经济与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存发展的混合型经济形态。有些西方人士与许多中国学者，认定中国古典社会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实际是一种严重误解。曾经，许多学者热衷于发现中国古典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借以论证中国也可以在自身基础上发展出资本主义文明。其实，这是很不了解中国文明根基历史的一种盲目研究。以他们的语言解读中国历史实践，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但是，按照其自身规则，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却永远不会发展为他们心目中的资本主义文明，而只能是中国混合型经济形态的一个阶段。

我们要强调的是，在漫长的中国古典社会，中国的商品经济活动虽然达到了人类农业经济时代的最高峰，但是，它依然是受到自觉而严格的制约的一种经济活动。所谓重农抑商，不但是一种长期持续的国家政策，而且是一种基于道德判断的价值观制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尽管商人阶层也曾经在某些时期诱发过政治腐败，也曾经诱发过社会价值观的错乱，譬如西晋时期的社会大腐败；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古典社会的商品经济活动，是在有效的道德基础与价值观体系下运行的；“利”之水势，始终徜徉在“义”之堤坝内。

当代的危机在于堤坝接近崩塌时，恶水已经从所有缝隙弥漫出来。

我们在西汉之后形成的传统道德体系，是基于儒家经典而产生的社会价值观与伦理价值观。具体地说，这些道德基础，譬如“礼义仁智信”五德说，宗法制与“三从四德”规范等等，都有许多腐朽僵化的东西，是必须扬弃性继承的。从更为根本的方面说，这些道德基础的形成，也不是我们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锤炼出来的竞争价值观，而是儒家被“独尊”

之后一家之言的道德概括。但是，它毕竟已经浸泡我们的民族意识长达2000余年，已经形成一种历史性的道德力量。可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它又恰恰在近代当代的两大历史洪流中，两次被整体性地打倒抛弃。也就是说，当我们面临严重的异质文明入侵时，当我们面临普遍的商品经济恶性价值观的全面冲击时，我们已经丧失了传统的道德力量与价值观基础；我们所拥有的，只有距离形成社会道德基础尚有很远路程的“主义”武器了。

历史地看，如果我们能在抛弃旧的儒家道德传统的同时，认真发掘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所锤炼出的历史经验，从而大规模重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无疑是一条更具建设性的历史道路。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的悲剧在于，既抛弃了历史传统形成的旧道德基础，又没有兴趣重新发现历史并建立新的立足于中国历史实践的新道德基础；我们对“白纸”自得其乐，我们对“历史”二字就此了结。这种悲剧性失误说明，我们的革命洪流下的“主义”意识，对人类文明的历史实践尚缺乏深刻的理解力；其最简单之处在于，我们自以为能隔断（割断）历史而“轻装”前进，能自由翱翔于“白纸”的太空。

这不仅仅是历史。我们的国家意识，依然停留在这样的境地。

惟其如此，我们的社会已经处于道德崩溃的严重危机之中。

无须具体地统计与举例了。社会道德的日渐沦丧、信用缺失、职业精神堕落、人际关系利益化、血缘家庭大量解体、老人境遇普遍恶化、年轻人精神畸形化、各个领域普遍腐败、执法丑闻数不胜数、官员腐败惊心动魄、国民素质普遍低下，等等，无一不令人痛心，无一不宣告着一个沦丧时代的来临。

虽然，我们不会丧失希望。但是，文明危机的泥沼已经越来越深了。如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依然没有民族文明的自救意识，依然企图用简单化的“经济主义”来达到社会均衡发展的目标，我们的前进道路将更加艰难。这种不断深化的价值观失序与道德崩溃，也许将发展为真正的文明灾难。

其二，我们的文明史意识空前混乱，缺乏文明重建的社会精神基础。

历史实践的延长线是：中国在走向世界并摆脱贫困状态30余年之后，社会精神的多元化正在初显曙光，对中国文明史的思考已经重新开始；在

此社会条件下，中国文明的发现、重建与跨越，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新的历史使命。可是，中国当代社会呈现的社会精神意识的混乱状况，却与这样的历史使命对文明发展史意识的要求相去甚远。一方面，基于对近代史以来简单化、政治化的隔绝历史的逆反心理，人文界知识界与诸多社会各阶层精英人士，对中国文明根基的认识，都重新回归晚晴时期的悲剧状态——以被“独尊”的儒家体系为中国文明的当然根基，对中国文明的复兴以倡导儒家文化为价值观内容。这就是所谓“国学复兴”的思潮与实践。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文明在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奠定的多元化的、强势生存的统一文明根基，我们的社会已经遗忘得太久。虽然，我们的文明根基时代，已经得到一部分社会人士与倡导学者的清晰评价，已经涌现出一批很有价值的思索成果；但是，我们的主流层面，我们的国家意识，依然基本上没有感觉。只有在社会层面，这些新理念有了相对普遍的认同。从总体上说，我们对中国文明在前3000年的历史实践中锤炼出来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或者说我们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始终没有自觉而清醒的归纳、提出与普遍讨论，更没有基本趋于共同的认识。我们的历史意识，仍然基本上深陷于“读经”的囿圈，仅仅以几个儒家大师的“四书五经”为标准去评判历史，而没有普遍进入对波澜壮阔而又鲜活生动的历史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并重新发现的历史高度。

历史实践证明，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其文明重建的第一要务，都是对本民族文明的根基时代作出历史的新发现与新总结，从而提供当下社会能够赖以前进的历史根基，提供当代应该而且能够继承，并在历史发展中已经定型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欧洲曾经的文艺复兴运动，所以越过中世纪的黑暗，而直接对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文明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发现与总结，正是这一历史实践的典型例证。欧洲如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更不存在超越历史实践的第二条或第三条道路。否则，中国文明的重建与跨越，就是十足的空谈。

可以说我们的社会文明史意识，在目前状况下还非常混乱。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国文明根基，除了儒家的“四书五经”，我们几乎说不清任何问题。这样的社会历史意识，要作为文明重建的社会精神基础，还有很大的距离。这是我们面临的文明危机的最为基础的忧患——缺乏对中国文明历